

卷首献辞

魏维贤博士，新马名流，南海硕望，道德文章，士林推重，我俩仰慕久矣。欣逢魏先生古稀华诞，遥望新马，无任神驰，不能无贺，故邀约当代著名专家学者撰文致贺。

溯忆 1989 年冬，上海学术界为庆祝姚楠先生从事东南亚研究六十周年举行学术研讨会，群贤毕至，济济一堂，或发表说言弘论，或朗诵璀璨华章，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沪滨雅集，不让兰亭。

在这次会上，我俩有幸与魏先生初次覿面，一见如故，从此，我们缔结了文字与道义之交，实属难能可贵。

魏先生 1929 年 4 月出生于新加坡。早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教育学系，后获英国伦敦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芬芳，成绩斐然。曾任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讲师、院长；南洋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工商银行首席执行官；南洋艺术学院院长等职。现任南方学院学术顾问，南洋学会会长。此外，并荣膺华东师范大学、海粟美术设计学院顾问教授，华南师范大学、琼州大学、暨南大学客座教授等重任，执学术界之牛耳，传灯不息，贡献卓著。

魏先生学富五车，教泽广被，著作等身。曾荣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勋章、日本学术成就奖章、新加坡共和国教育服务章……等，天道酬勤，令人敬仰。谨述其行谊如上，谅邀学术界方家达览。

魏先生热爱中国，情有独钟，素有“中国之恋”美称，蜚声遐迩。近年来，他为新中两国友好和学术文化交流，几乎每年都不辞辛劳地风尘仆仆于大陆新马之间，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即席发言，或

宣读鸿文，颇多真知灼见，与会者深受启迪。魏先生为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席不暇暖，殚精竭虑，备极辛劳，有口皆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耿耿此情，临颖怀想。

我俩自与魏先生相识后，鱼雁常通，接触频繁，高谊隆情，深刻难忘。

早在1986年南洋学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出版丛书，魏先生特约陈炎撰写《缅甸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一文，次年刊于《南洋与中国》学会纪念丛书出版；同年，陈炎又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之文，刊于《南洋学报》第42卷1、2期；为悼念先师、南洋学会早期创始人姚楠先生，《南洋学报》第51卷特出专辑，我俩又承蒙魏先生约稿，有幸和他同时撰文三篇，刊载于该专辑卷首^①，可谓缘分不浅。此外，陈玉龙又蒙魏先生约稿，撰写《早期南洋研究的拓荒者张礼千先生》一文刊登于《南洋学报》第50卷。由此可见，我们三人在文化、学术等各项活动中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彼此呼应，相互默契，特别是这次编辑纪念文集，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陈炎一再由衷地情不自禁地自述：由于魏先生大力鼎助，“在我80高龄时圆了我人生的三个梦：（1）为庆祝我80岁，资助出版了我的晚年代表作：《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论文集；（2）推荐、接纳我成为新加坡南洋学会的正式会员；（3）邀请我访问新、马，作学术报告，并与老朋友、老同学欢聚”。寥寥数语，吐诉心声，情深意长。

同样，魏先生对陈玉龙赴新马举办书法展一事也表现了极大的热诚。多亏他艰难筹划，精心安排，细致深入，无微不至，从而使展览得以顺利进行，收到预期效果；更使陈玉龙深切地感受到在人生旅途上迈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学无止境，艺无止境，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① 《南洋学报》第51卷，悼姚楠教授（1912—1996）专辑，卷首刊有魏维贤、陈炎、陈玉龙所撰三文，题名从略。

值得一提的是：魏先生洞烛机先地将此次展览列为南洋学会六十周年庆祝系列之一，一举两得，效果甚佳，受到人们的赞赏。

不仅如此。我们三人还将这片深情厚爱推及于下一代，古人所谓“爱屋及乌”，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事。魏先生的千金魏玉心小姐资质颖异，聪明好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经常到陈炎家作客，亲如父女。后来，她在香港大学建筑系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需参考“圆明园西洋楼”的原始设计资料。陈炎为她到处奔走，设法寻找，凭其坚毅赤诚，终于找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魏小姐如鱼得水，喜出望外，不辜负双亲和前辈一番苦心写出优秀论文，荣获博士学位。魏门两代博士，父女薪火相传，猗欤盛哉！亲朋师友弹冠相庆，一时传为美谈。

如上所述，魏先生对我俩如此真诚，如此厚爱；我俩也力求酬答，报效一二。古人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我等交往，崇高友谊，永志不忘。谨以“相处以诚，相濡以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十六个字概括之，当非溢美之词。

此书为我俩精诚的合作，献诸文坛同好，足慰平生。

本集作者都是当代学者名流。季羨林、张岱年、周一良三位教授，是北大文史哲著名三老，德高望重，或年逾九十，或当望九之年；其他撰稿人亦多为年逾半百、花甲、古稀，蜚声中外的教授学者，也有恰当盛年、风华正茂的俊彦。承蒙诸先生惠赐鸿文，阐精发微，胜义迭出，有广度，有深度，既嘉惠读者、后学，又给本集增添不少光辉。在此，我们谨向诸位作者和大力支持本书编辑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周月梅、沈昆朋二位编审深表敬意、谢意。本集中不足之处，敬祈海内外方家贤达和读者们不吝指正，是幸！

是为序。

镇江七九叟陈玉龙
庚辰初春 鄞县八四叟陈炎
谨识于北京大学燕园

附录：魏维贤博士主要著作目录

《教育论丛》，1968 年

《马来西亚、新加坡教育发展》，(与黄开济合著)，1973 年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与郑良权合编)，1975 年

《三州府与马来联邦官方教育报告书 1870—1939》(与黄开济合编)，1980 年

《马来亚官方教育报告书 1946—1962》(与黄开济合编)，1989 年

另有在海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暨主编的一些刊物(如《南洋学报》、《教育论丛》等)

代 序

（《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

季 羨 林

最近几年，我在几篇论文中，在学术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中，都提到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只要稍稍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并不难明白。试想，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今天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我一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说文化只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产品，即使不是法西斯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至少也含有民族歧视的因素，是与历史事实相违的。当人类初成人类时，当由狩猎者多为采集者时，为了生存，人类就会开始交流经验。哪一种动物能吃，好吃；哪种植物能吃，好吃，这样的经验都需要交流。范围一扩大，组成了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交流，就成了逐渐扩大的文化交流的滥觞。这种交流，对人类的生存与繁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起的作用是决不可缺少的。事实不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吗？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交流的范围日益扩大。物质方面固然可以交流，精神方面何独不然？宗教信仰可以交流，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天文、历算、科学、技术等等的交流也屡见不鲜。至于哲学、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这些交流所起的作用，不管是能明白无误地感受到，还是隐而不彰，难以感觉到的，都有大量的事实可以列举，用不着更多的例证。

到了今天，人类已经处于 20 世纪的世纪之末；再过不多几年，一个新的世纪就将降临世间。全世界的民族，不管多么僻远，多么

落后,无不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文化交流的甜头,苦头当然也是有的,毕竟是甜头为主。但是,我个人深切感觉到,在全球的芸芸众生中,究竟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呢?在这一方面,人们大都是浑浑噩噩的,“不识不知,顺辛之则”,连文化交流这个概念都完全是陌生的。

同世界历史上——一些时代——也可以说是一切时代,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相比,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定,也谈不到友谊和团结。这种情况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再去描述。我在这里谈的是过去和现在,那么将来怎样呢?如果人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去努力加以改变,则鉴古以知今,鉴今以知未来,人类在未来也不会得到安定,得到友谊,得到团结。

可是我偏偏有一个信念:我相信,不管今天人类所处的境遇多么糟糕,也不管人间有多少是非,有朝一日——当然是在遥远渺茫的未来——人类终将共同跻入大同之城。至于用什么形式,那不是主要的问题。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步,决不能空等天上会掉下馅儿饼来,人们必须努力,张皇人类中的安定与友谊,和平与稳定。这种张皇不是诉之于宗教信仰,而是诉之于理智,这里面包括思辨与行动。我觉得,我们首先必须让人们从切身的感受中了解到,人类是互相依存的,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浑然一体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大道多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必拘泥。但是,我总认为,其中有一条阳关大道,这就是撰写文化交流史。从中国来说,就是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不必空讲大而空的道理,而读者自然就能油然而产生友谊与感情,团结与安定从而出现,难道这还不算是一条阳关大道吗?

根据我这种肤浅的了解,我们这一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的目的就在于此。因此,这一套丛书既有深切的学术意义,又有实

用的现实意义,决非空洞的为学术而学术。

以上所论,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虽是本丛书的主编,决不想强加于人。每一部的作者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至于材料翔实,立论谨严,实事求是,不尚炫耀,我相信每一位作者都能做到的,就不再啰嗦了。

是为序。

编者附记:

季老已入望九高龄,亲自为本书签写书名,又蒙亲赐这篇序,作为本书代序,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包括《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舞蹈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史学交流史》、《中外军事交流史》、《中外科技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计12卷,由季羨林教授总主编,1998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季羨林,生于1911年,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深造,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暨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以及若干社团的会长、名誉会长。著译丰富,已汇编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先生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于一身,为我国不可多得的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东方伦理的历史演变及其走向

张岱年

这所谓东方伦理其实是指东亚伦理,即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东方的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起源很早,但孔子以前,由于史料缺乏,难以详考。还是从孔子讲起。孔子提出比较系统的伦理学说,主要是讲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孔子的最高原则是仁,仁的主要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人我俱立,人己并达。立是一个重要观念,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即承认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意志。己立立人,既要实现自己的立,更要帮助别人立,这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己欲达而达人”,不但自己要发展,而且帮助别人发展,这表现了社会责任心。孔子曾经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肯定了个人对于人群的责任。孔子主张人我兼顾,群己并重。这一思想是深刻的。但是孔子学说有一个重大缺点,即承认等级区分是必要的,认为对于贵族与平民应持不同的态度,这表现了时代的局限性。

孟子明确提出人伦观念。据孟子说,人伦是帝舜时代契教导人民的,“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否舜、契的思想,无从考定。孟子明确提出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孟子强调了君臣关系的相对性。“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更提出“民贵君轻”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为贵”观点是有理论基础的,这就是他的“良贵”学说。孟子不但讲良知良能,而且讲良贵,

良贵即是天赋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谓之良贵。西方讲天赋人权，中国古代没有天赋人权的观念，而有天赋价值的观念。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先秦时代，道家强调个人的自由，反对等级制度。杨朱为我，即反对君权，有重要意义。但道家忽视社会责任心，也是一个缺点。

到汉代，提出三纲观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否定了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妇对于夫的独立性，加强君权、父权、夫权的绳索，对于社会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到宋代，三纲观念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南宋理学家罗从彦提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朱熹弟子陈埴又提出“天下无不是底君”，更把父权、君权绝对化了。程颐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清时代，出现了很多的贞节牌坊，妇女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地位。

宋儒虽然重视三纲，但也承认民贵君轻的观念。朱熹《孟子集注》云：“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明清之际，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提出了对于专制君权的批判，宣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但是《明夷待访录》被列为禁书，直到清末，才广泛流传，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真正的民主还没有建立起来。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比较彻底地批判了传统伦理，提倡个人主义的新道德，其主要成就是否定了三纲，批判了封建礼教；但是也表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对传统缺乏分析。于是有些对于传统文化体会较深的学者起来宣扬孔学的精义，于是形成对峙的局面，但新思潮影响较大。

新中国成立，50年代初期，宣扬“为人民服务”的新道德，取得很大的成就，社会风气空前良好。但是，1957年以后，“左”倾思想泛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致使人与人之间不敢讲真

话。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更破坏了一切道德原则，社会生活陷于混乱。

1978年拨乱反正，进入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现在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要建立新道德。但是道德不同于法律，法律可以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由政府颁布。道德则不能由政府制定，而是逐渐形成的。新时代道德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明确的，这便是：（一）爱国主义原则，（二）为人民服务原则，（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原则必能取得人民的公认。

对于中国传统伦理，应持分析的态度。传统伦理中有些陈腐的内容，如三纲，应彻底批判。传统伦理中也有一些精粹的观念，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我俱立，人已并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公共生活规则”，这些公共生活规则是“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就能“自动地遵守”的。儒家所讲的一些道德原则，其实正是公共生活规则，还是应该肯定的。

到21世纪，中国文化必将有新的的发展，一方面赶上西方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一方面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达到更高的水平。在伦理道德方面，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平等的关系，实现更高水平的精神生活。

编者附记：

张岱年先生是本集作者中年龄最高的长者。此次大力支持，惠赐鸿文，为本集增辉，谨深表谢意、敬意。

作者简介：张岱年，生于1909年，原籍河北省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中国

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及文化问题的研究，著有《中国哲学大纲》、《真与善的探索》、《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著作多种，论文数十篇，汇编为《张岱年文集》6卷，《张岱年全集》8卷。

《华夷变态》与东南亚史料

周一良

摆在我面前桌上的一部大书，三巨册，3006 页。由东洋文库发行，发行者是榎一雄。非卖品。上册，1958 年出版；中册，1958 年出版；下册，1959 年出版。这部大书，就是有名的《华夷变态》。最后总校和整理，由山根幸夫担任。

五、六十年代，国外买书很困难。历史系顾文璧先生有一位朋友在日本，1963 年，我就托他买了一部。应该说距离出版时期还不算晚，可谓“得风气之先”了。

大家知道，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不久，就采取“锁国政策”。但幕府统治者还是想了解外国情况的。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从荷兰到日本长崎，有荷兰商人向政府提供情况，即所谓“荷兰陀风说书”；另一条是日本商船载有中国商人，也在提供情况。

华——指中国；夷——指东南亚各国；变态——意思是种种情况。

这部书所包括的年代是：从日本正保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到元禄十年（清康熙 36 年，公元 1697 年）。

我得到了这部书，不胜雀跃。当时我就读了浦廉一教授提纲挈领地书前面所写的解说，大致概述了本书的研究情况。我兴致勃勃地立刻想就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很快来了，一下子就是 20 年，我始终没有摸过这本书。

那时，清朝船只主要是从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南方各省开往日本，有的船只是先到东南亚再开往日本的。船上载有东南亚华侨，因此，这本书所记载的材料也就包括了东南亚各国的情况。

80年代后期,著名越南史专家陈荆和先生作为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到北京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学术访问。我们相见甚欢。提起这部书,都很重视。我们就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进行磋商。我觉得,日本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不少成绩,我国学者还没有着手做,因此,也就更有紧迫感。本书所载东南亚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重视。于是,我们商量由两校组织人力,通力合作。先把这部书中的东南亚史料翻译出来,然后再逐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陈先生表示同意。可惜他回到日本后,此事再没有下文,也就不了了之。

我和这本书接触为时已是30年左右了。回顾起来,虽然接触这部庞大材料时间不算太晚,但蹉跎再蹉跎,迁延再迁延,一直到今天,终于没有很好利用,深感懊恼。

据山根幸夫先生见告,松浦章教授根据这部书写了很好的文章。还有其他几位日本学者也相继取得可喜的成果。

我刚刚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又由于某种突然原因,未能进行下去。

书中所记东南亚情况,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比较平静;东京(越北)、广南(越南)两个统治者斗争甚烈;柬埔寨三王相斗。

书中还提到一些地方,如:噶喇吧,又作咖喏吧,……即今之印尼首都雅加达;噶喇吧附近之万丹以及大年(即大泥)等地。不一一列举。

这部书,记载虽然不是很详细,但很宝贵,富有史料价值,应当充分利用。

这次,陈玉龙先生为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博士七十华诞祝寿,征集纪念论文,想请我也写篇文章,共襄盛举。我的文章虽然没有写出来,有负南洋学会会长魏维贤先生和玉龙先生的好意,但我仍然想把材料提出来,希望引起新加坡南洋学会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们的重视,充分利用其中材料。

我想,此举不会是徒劳的吧。

公元2000年2月15日米寿老叟

编者附记：

周先生客岁因摔跤骨折，行动不便，再加上某种特殊原因，未能伏案撰稿。无奈口述录音，委托编者代笔，逐字逐句，整理成文。谨志谢忱，并飨读者。

作者简介：周一良，生于1913年，安徽东至人，幼读家塾10年。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39年赴美深造，194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任哈佛大学日文教员两年。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译述丰赡，著作等身。对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敦煌学和日本史、亚洲史等方面的研究颇多创获，贡献卓著。

中国古代建筑的璀璨明珠

——对北京紫禁城和天坛的美学探索

杨 辛

历史上的北京城留下了许多古建筑的瑰宝。而紫禁城与天坛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颗璀璨的明珠。它们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体现了美的两种不同类型。下面分别对紫禁城和天坛作初步的美学考察。

一 紫 禁 城

紫禁城的概况

紫禁城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亦称“故宫”，位于北京中心地带。明永乐4年（公元1406年）在元宫殿遗址上开始营建，永乐15年（1417年）大规模兴建，永乐18年（1420年）基本建成。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72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万多平方米。宫殿分前朝、内廷两部分。从明代永乐帝（朱棣）到清代宣统（溥仪）共491年，住过明代14个皇帝，清代10个皇帝，共住过24个皇帝。

紫禁城历史久远、规模宏大、保存完整，不仅是我国灿烂古代文化的一件瑰宝，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珍品。

1961年国务院公布紫禁城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紫禁城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包括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这里主要是谈审美价值。通过对审美价值的分析说明民族的创造和智慧。

(一) 紫禁城的美具有时代的烙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紫禁城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体现了封建帝王的意志——帝王的至尊。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哲学思想则为帝王至尊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紫禁城建筑的总体设计中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具体表现。紫禁城的核心建筑为太和殿,所谓“太和”意思是保持宇宙间高度的和谐。太和殿的名称象征封建统治秩序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天帝授权帝王统治人间是天经地义的。紫禁城许多建筑的名称和位置都是按照一定宇宙模式来确定的,如内廷的乾清宫、坤宁宫象征天和地,两侧的日精门、月华门象征日月,东西六宫象征十二时辰。还有皇城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在北京城东南设天坛,东北设地坛,城东有日坛,城西有月坛等等。

帝王至尊的思想在建筑中的具体表现:

在总体设计上表现为“天子居中”。紫禁城方位的选择是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天子居中”体现中国古代的礼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宋人聂崇义对《考工记》中所述王城,曾绘图示意,并说明“王宫当中经”。《吕氏春秋·知度》中也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王者所以“择中”,因为中心地位显赫,“中”是核心,四围是从属。从整体形势看,中心是处于层层拱卫、八方呼应的重要位置。

明、清紫禁城正是处在北京城中心地带,由三套方城(内城、皇城、宫城)围合而成。

从紫禁城名称的由来看,则使“天子居中”的礼制,上升到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哲学境界。昔谓紫微星垣(北极星)位于中天,众星环绕,为天子所居,称紫宫。明清皇帝的宫城称紫禁城,位于北京

城的中心地带,这正是与紫微星垣相比拟,暗含君权神授的思想。

故宫不仅是北京城平面的中心,而且和北京城南北中轴线重合,实际上京城的中轴线是由紫禁城中轴线向南北延伸的结果。故宫的建筑群是一个纵深的系列,故宫的主体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中轴两侧建筑保持对称,以烘托主体。这种中轴线的整体布局,在空间与时间的结合上更强化了核心建筑的重要地位,更强烈地表现了帝王至尊的思想。中轴线的采用使人们在时间过程中逐步加强对空间、形体的感受,并引向高潮。以太和殿为例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太和殿是故宫建筑群的核心建筑,象征帝王的至高无上。它位于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在建筑群中处于深、宽、高的集中点。

(1) 深:北京古城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5公里,是一条很长的中轴线。故宫建筑与这条中轴线重叠。从正阳门到太和殿全长1700米,经过一座又一座的桥,一重又一重的门,一层又一层的台阶,还有那一道又一道森严的禁卫,最后才能到达太和殿。现在我们站在天安门外向北遥望,透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的通道所见到的是一个门洞套一个门洞,最后视线消失在太和门前,太和门成为隐蔽太和殿的屏障。

这种空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封闭是结合在一起的,过去的北京城从内城(正门为正阳门)、皇城(正门为天安门)到紫禁城(正门为午门),是一个层层紧缩的封闭空间。南北的中轴线正插入这个封闭空间中。由于这种笔直纵深而又封闭的空间造成了一种神秘而严肃的气氛,使人感到皇帝所在的地方简直是深不可测。所谓“隔则深,畅则浅”,深的效果由于“隔”而加强。从正阳门开始层层隔断,大清门一隔,天安门一隔,端门一隔,午门再隔,最后太和门又是一隔。这种空间上的重复隔断,使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神秘感和期待感。过去所说的“侯门深似海”,也体现了建筑空间的深度与封闭所形成的森严气氛。

我国宫殿建筑多采用纵深布局的传统模式。如山东泰安的岱